

草木人情，雅俗共赏

——读汪曾祺《人间草木》

邓思洋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汪曾祺的散文集《人间草木》记录着他对于草木自然的真切热爱,他从生活的平凡小事中取材,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创作出每个人都能读懂的诗。在以宏大歌颂主题为主流的时代,他乐于展示着细小琐碎的“俗”,又透射着古典主义名士风的雅。汪曾祺的创作经历丰富也曲折,和美的童年、西南联大的学习与挫折人生经历共同塑造了他的创作风格,让充满着人间烟火气的文字,更抚凡人心。

关键词:汪曾祺 情味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082(2023)01-0263-03

曾有人让汪曾祺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思想,他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其本人也常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人间草木》里记录着汪曾祺对一果一蔬的思考,对季节供养的惊喜,对四方游历的感慨,对联大师友的怀念……隽永平和的文字娓娓道来平凡小事、草木人情,高颂返璞归真的田园牧歌,感受凝视岁月后的“情味”^[1]。

一、世情和诗意并存的散文风格

1. 散文里的田园诗风

在《归隐派与名士风度——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论》一文中,作者提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展示的是自然层面的乡土,是体现中国人生命哲学的古朴悠久的自然与纯朴宁静的乡村生活”^[2]。“乡土作家”从鲁迅开始,其文字突出“平淡朴讷”的特点,不同于鲁迅一派的主流乡土文学,沈从文、汪曾祺则更富有田园诗风归隐怀旧的情感,他们平静自然的展现着乡土的质朴,原始和淳真。只写意不写实是二者文风成熟后期作品的共同点,单纯的返璞愿望就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归隐田园诗风有朴素自然的异曲同工之妙。

汪曾祺出生书香门第,接受的是更为丰富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他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人间至味》中,他奉劝诸君“一个人的‘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如果口味单调也不要紧,关键是要有一颗开放的心,培养自己多一点的生活情趣”^[3]。汪曾祺小说与散文中的美感极大部分正来源于他语言中的“味”,这种味源于他对寻常人生平凡小事诗意的发现,也源于他本人对世俗生活人情味的珍视和咀嚼。

2. 乐天派的大白话

《葡萄月令》用笔简洁但意蕴丰深,饶有情趣。汪曾祺把自己的性情与葡萄的“性情”融汇与文章中,洋溢着田园里的劳动之美。他是“希望把散文写的平淡一点,‘家常’一点的”^[4]。《人间草木》的多篇都反复出现设问、反问的修辞和表解释的破折号、感叹号及拟声词的使用。简单质朴的口语化文字让散文的亲切感和读者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王尧在《中国最后一个古典诗人》中提到“职业性的散文家成功者极少。我无非想说,散文作为边缘性的文体一旦被职业化,其审美空间就会变形和萎缩”^[5]。而汪曾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让他后期更善于“以小见大、以物见情”。他的生活是积极的,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句看似孩童思维的、逻辑简单的话却点醒着读者对幸福的思考,看到了汪曾祺平淡的文字里,藏着的赤子之心。

3. 文字里的“情味”

《人间草木》汇集了汪曾祺对花草景致、各地美食、四方周游、难忘岁月的无限回味,其中第一辑“一果一蔬”便记录着其对草木的热爱,对葡萄的历史溯源,对各地品种梨的研究,对不同豆类食用方法的探索……取之于自然,构建出自然,这便是汪曾祺散文中自然和谐之美的本源。不刻意追求华丽辞藻的文中,巧妙的意象组合使其散文洋溢着清新之美。

汪曾祺散文读来有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感,王维将留白手法从丹青用到吟诗,而汪曾祺的留白手法也是其散文中一个极其突出的特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汪曾祺喜在结局留白,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葵·蕻》:“许多东西,乍一吃,吃不惯,吃吃,就吃吃出味儿来了。你当然知道,我在这里说的,都是与文艺创作有点关系的问题”^[6]。没有繁杂的铺陈,没有刻意的故事布局,没有深刻

的升华语句，却重新牵动着读者的思绪。从南北东西的人们吃葵种薯到鼓励年轻人尝尽天下新鲜事物，汪曾祺仅用一句一段就将读者引入更高的思想境界。他诗意的解构生活，但客观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都在读者的思绪中重构，充分表现着其散文中意象与意境表达的情感的张力。

4. 准确的语言

汪曾祺提及语言：“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7]。”多短句是汪曾祺散文语言的风格之一，除却文章内涵及情感的留白，其语言也喜“留白”。文章多以短句、单句为主，言简意赅，定语状语补语等修饰部分常被删去，有时甚至连主谓宾的规范结构都被删减。这让其文字表达效果更亲切自然，上下句间的逗号如同日常闲聊白话时对方突然的停顿，上下关联却又如同耳语，自然简练。《葡萄月令》中口语化的句子短促有力，气韵生动画面感强烈。《四川杂忆》描写杨升庵祠亦是用简单的白描便将环境交代的清楚了，读着利落看着清晰。《枸杞》中不夸张、不做作，文中的对话是书面语却又好像与现实面对面交流高度相似，灵动且有生气。用最简洁的、口语化的文字描写对话，准确、通俗。

汪曾祺说：“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后面是有文化的^[9]。”口语化的韵律看似通俗，但汪曾祺的散文是“俗”而能“雅”的。他写的是白话文，偶尔有些文白参半的句子，但更深的底蕴在于其篇章中博古通今、逐本溯源的历史文化以及游遍四方大江南北的见闻感悟。全书散落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时难数。而在一篇白话俗语和古典文学碰撞的散文里，汪曾祺用最质朴的方式、平淡的语言、澄澈的眼光将民俗风情、田园风光、草木之源娓娓道来。

5. 平淡的人生追求

《泰山片石》一篇反映着汪曾祺许多对人生追求的思考。“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泰山是强者之山。”汪曾祺长子汪朗的文章《随遇而安：汪曾祺在北京的几个住处》，展现着生活中讲究着随遇而安的汪曾祺，面对烦琐的住房申请他觉得只要凑合就行，面对无法拒绝的工作他沉浸其中，甚至对劳动表现出格外的兴奋。正如他在《泰山片石》里描述自己：“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齐之山，殆矣^[6]。”其散文与小说多源于俗世中的凡人琐事，用平视的视角，不人为拔高。《韭菜花》一篇，汪曾祺认为极平常但是极有味的东西是应该出现在文学作品里的。他善于以平凡小物见情，在俗世俗人的身上，他往往津津乐道那些清新

脱俗的诗意的东西，读来“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古稀之年再登泰山，汪曾祺认为自己更清楚地认识到人的微小、平常，也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他追求自然本真、大道至简、随遇而安，享受无法避免的“苦难”甚至报之以歌，他将俗世中的雅致细致挑拣剖析、打磨锃亮，再裹上自己澄澈纯粹的情感，播向人间的每一寸草木。

二、汪氏写作风格的形成

汪曾祺的写作风格受三个方面的影响最大：幸福的成长环境、西南联大和其老师沈从文、不平坦的生活道路。

1. 幸福的成长环境

“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看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性气息^[1]。”汪曾祺在散文《在西南联大》中思考自己的写作起始。他自小善于观察，热爱生活的特性也成为其创作和歌颂平凡的根源。汪曾祺出生在江南水乡的一个传统士大夫家庭。祖父原是清末的“拔贡”，科举废除后又继承了家中的药房，成了一名医生。父亲是一位性情温和，精通书画、音律和体育的才子。而影响他一生的四位女性也都是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的人。他在散文《花园》中回忆起幼时，家中有个没人侍弄的大花园，但这里成了他童年最喜爱的小天地。“日涉以成趣”，一个“荒芜”的花园成就了汪曾祺的自然之趣。与草木虫鱼为伴算是他学会体味自然生活的开端，而这个开端也在日后不断发展壮大，使其擅于以最为直接的方式——用感官体验去感知世界，更成为其创作美好、亲近自然、传递温情的根源之一。童年给汪曾祺带来幸福感的同时更深远的是塑造了他积极温暖的性格和饱满的灵魂，这让他始终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去创作、想象，并赋予文字更丰富的内涵。书香门第的出生、和美富裕的家庭、肆意欢脱的童年，西南联大里的饱读诗书、文学大家眼中的写作天才……在轻松愉悦氛围里成长的汪曾祺总以最大的善意看待世界，这段充满着梦与爱的成长经历也让他更善于发现平凡美，保持着乐天派的向上精神，并积极反映在他的文字中。

2. 西南联大和其老师沈从文

出于对沈从文的仰慕，青年汪曾祺来到了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中，他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6]。”可见西南联大对其人生规划的影响之大，而这里也成了汪曾祺在写作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汪曾祺在联大的文学积累是极其

丰厚的，他每日沉浸在文字里，思考着自己的文学创作，谈及此事，他认为这一时期对其写作影响最大的非鲁迅、沈从文、废名莫属。其中，作为其老师的沈从文对汪曾祺创作的影响最为深远。

汪曾祺多次在散文中回忆沈从文先生授课时的场景：“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歉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强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话里并未挥发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6]。”在沈从文的课上，汪曾祺学到了丰富的写作技巧：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对人物的生动刻画、自由的创作、任意散发的思维以及归隐派的名士风度，他深受沈从文写作风格甚至性格上的影响。现实中的汪曾祺也有着与沈从文一般的诚恳和谦逊，即使是成名后，他仍在散文《泰山片石》中自述：“我不是强者，不论是登山还是处世。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

3. 不平坦的生活道路

汪曾祺初入文坛便下定决心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潜心挖掘平凡生活，遵循内心创作着乡土风情的小说。汪曾祺在散文《沈从文的寂寞》中回忆其所受的思想影响：“‘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情感’一个作家，要有自己的风格，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必须耐得住寂寞，不要赶时髦，不要追求‘票房价值’”。这份初心和随心所欲的性格更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汪曾祺的散文和小说创作，成就了其平和闲适淳真的乡土文风。但如其文俗而能雅一样，汪曾祺的散文并非大众归结的“闲适文学”，他不迎合主流亦不愿自己的作品被商品化的挂上闲适的标签，汪曾祺在散文的创作中完完全全的做自己、畅快肆意的抒情、真情实感的诉说。

在歌颂作品进入创作高潮的70年代，汪曾祺创作小说讲述农村儿童单纯善良的美好成长故事。80年代再入文坛，他已经历了颇多的曲折坎坷，在创作中断的空白期，他醉心于对民俗文化和美食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散文也多围绕各地美食及民俗文化展开。在《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他写道：“我的生活道路也给我带来了很深刻的教育，不平坦的生活道路对我个人来说也不是没有好处的。经过长久的学习和磨炼，我的人生观比较稳定，比较清楚了，因此对过去的生活看得比较真切了。”故此，面对改革和歌颂文学等主流题材，汪曾祺蓦然回首，开始了大量随笔散文的创作，回忆起对平凡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怀旧和

对“随遇而安”的追求。他在晚年的散文《随遇而安》中解释道：“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环境的原因。”汪曾祺后期的作品仍不讽刺、不埋怨，因为“我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1]时间消磨着创作者的热情但不减其对乡土的感情，这是汪曾祺文字里情味的来源，也是他在不平坦的生活经历后仍保有童年成长中那份纯真美好心灵的佐证。生活是有些许艰难的，但美好积极的初心能够让他宠辱不惊、宁静淡泊。他说“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动感情的人^[6]。”恰是他最动情、最懂情、最长情，才能从一而终、遵循初心，做“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

《枸杞》中穿的整齐干净的离休干部捡枸杞玩，两个童心未泯的老人被汪曾祺称作“两个老孩子”；《槐花》里高高瘦瘦的养蜂人过着安静平和的放风生活，享受“农村式的浪漫主义”；《洪椿坪》寺里的和尚随心而行、游历山川，做真实而赤诚的自己……《人间草木》中记录着汪曾祺的怀旧和他眼中饶有趣味的各异人生，他将回忆里的一粥一饭、一草一木吟诵成每个人都能读懂的诗，让草木人情都能雅俗共赏。

参考文献

- [1]汪曾祺.晚翠文谈[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 [2]杨联芬.归隐派与名士风度——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02):52.
- [3]汪曾祺.人间至味[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
- [4]汪曾祺.蒲桥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 [5]王尧.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再论汪曾祺散文[J].苏州大学学报,1998(01):80.
- [6]汪曾祺.人间草木[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
- [7]汪曾祺.中国作家的语言意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作者简介:

邓思洋(2003—),女,汉族,湖南长沙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

葛春蕃(1970—),男,汉族,湖南双峰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